

· 高谈阔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系列讲座 ·

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范式

(德) 格哈特·普莱尔(Gerhard Preyer)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社会科学系, Frankfurt am Main, Germany)

摘要: 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研究是对现代性理论新的发展, 这一理论强调全球化语境中现代化的发展, 催生了本土化、通俗化、混杂化趋向, 彰显出对元叙事的怀疑和批判。进一步, 多元现代性理论着眼于全球社会系统, 考量其内在复杂的紧张和冲突, 强调社会成员的自我观察引发的公共领域变迁, 最终将思考的重心置于全球世界体系, 而非不同的社会结构。

关键词: 轴心文明; 结构进化; 异质论; 同质论; 公共领域

1. 轴心文明与作为结构进化焦点的归属情结

过去 30 年间, 艾森斯塔特(Shmuel Noah Eisenstadt) 在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 杜鲁门研究院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系弦歌不辍, 提出并实施了一项比较文化研究计划。一直以来, 艾森斯塔特都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轴心时代文明^①——所谓的高阶/高级文化(Hochkulturen)——的沿革和成就上。与阿比特布尔(M. Abitbol) 和查赞(N. Chazan) 一道, 艾森斯塔特的宏观社会学研究关注早期政治组织(国家) 演化的缘起, 尤其是以非洲作为考察对象。他通过研究发现, 在早期各不同的国家或政体、部落社会、城邦和世袭体制中, 存在不同的中心和不同的中心—边缘关系(center-periphery-relations) (E. Shiles)^②。有必要提到的是, 艾森斯塔特关于移民以色列(immigration to Israel) 的研究, 堪称移民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多数社会学家赞同这样的观点: 社会进化是社会变化种种过程之缩影。社会变化机制是社会学理论和跨学科研究的对象。艾森斯塔特接受古典进化论的基本内涵——人口具有强烈的扩张倾向。结构进化的推力就是这种扩张, 这一点已被诸如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和人口学等不同学科的进化论研究所证实。艾森斯塔特研究了演变过程中不同扩张要素的发展特征。演变及其突破的重要性在于信念系统(韦伯所谓的世界观, Weltbilder) 的定向及其制度化, 对于宗教团体、法律职业群体、官僚精英或世俗精英群体的形成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合法性(Legitimation) 问题, 在进化扩张过程中, 它对增强各类社会系统成员的社会凝聚力至关重要。社会秩序的合法性是一种功能需要, 对政治系统而言更是如此。合法性问题不在于其正确与否, 不在于其确立了价值标准, 也不在于韦伯所谓的信念合法性, 而是结构耦合的功能性需要和社会系统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社会学理论中的这种转向, 把合法性问题转换成

① 如以色列王国和早期希腊。艾森斯塔特还研究了伊朗拜火教、中华早期帝国、稍后的基督教(包括其各种分支和变形)、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所谓轴心时代文明, 是以超验性秩序和世俗性秩序之间的张力来表达的。

② S. N. Eisens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Empire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3.

一种新视角,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当然也不是社会系统成员信服合法性的价值标准的有效性的问题。它是政治系统对社会结构耦合所做的一种贡献。

2. 结构分化的机制及其反常情形

与古典进化论不同之处在于,艾森斯塔特认为,人口扩张的各种维度并不一定共同作用。因此,社会进化并不是由结构分化的要素之间的均衡模型来验证,也不是用描述演变方向的理想均衡来证实。恰恰相反,结构的演变是一种充满矛盾、张力、冲突和革新的变化,无法从整体性和连续性上来把握。扩张的不同维度在适应上的不同步,是由于社会劳动分工和精英的基本功能(the basic elite functions)造成的。

它们因分化过程的挑战而起,例如,各类社会系统成员间信任的维系、权力和暴力的限制、意义的建构^①以及不同互动模式的合法性。这对于传统型社会非常重要,可以使特有的行动系统分化不被互相渗透。这一点非常值得强调。^②一个可能的应对之道在于精英作用的发挥,必须把这一点从社会劳动分工的功能需要中区分出来。社会学关于结构演化的研究还没有考虑到这些差异。我们回顾社会学理论史,就会不幸地意识到,社会学家用劳动社会分工的范式描述社会结构演化和社会变化,其结果是,社会学家阻碍自己对社会变迁的理解。

3. 概念的矫正与重释: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以及现代主义

进化比较研究表明,扩张各维度间的延迟是由这些维度的不同组合所引起的。不同维度组合是各类社会和文明产生的推力。考虑到现代社会体系的出现,这一点对现代化理论极为重要,对全球化时代而言也意义重大。我们必须区分现代性、现代化、现代和现代主义这些概念的不同内涵。现代性(Modernity)用于刻画经济、政治、法律、各类共同体和科学社会系统领域中社会结构的革新。这些革新属于功能分化,发生并贯穿于整个古欧(the Old Europe)历史。这是古典社会学的观点。现代化(Modernization)被用来指陈一种时空决定的过程,并被理解为唯一的进化方向,它引发了现代文化和社会的革新。这一过程在持久的结构性趋向(structural tendency)中体现出来。对于这种结构变动,古典社会学理论称之为行动系统的分化、结构的分化,以及源自普遍性进化中的全球世界体系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学家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系统综合,他们或多或少持韦伯开创的传统。现代(The Modern)描述当代与传统之间的差异,诸如体现在现代艺术、文学、经济学方面的差异。这一概念也可能被用来评价(价值)。该术语自18世纪后半期被使用;在19世纪中期,摩登时代(现时代,modern times)被重新理解为一个新的纪元,并且导致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它与一个社会系统或社会层级之内成员的地位不再相干。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现代性的古典时期,正是它终结了市民社会,也终结了18世纪中期以降的欧洲国际政治体系所孕育和型构的现代民族国家。自19世纪中期起,现代这一概念已被作为西方(the West)的同义词使用。这一地理学的隐喻,以一种有目的的修辞方式,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粗略分类。在强调文化系统、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以及共同体之间(如西方与东方、南方、东南亚、中欧)的差异和冲突时,它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Modernism)被用来表达所谓的先锋(avant-garde)的理性的社会运动和态度。与此同时,文化和政治上的反向运动作用也不可小觑。当我们提及现代主义,摩登时代是一种关于科学、艺术、法律以及社会团结的自主和抽象的描述。

① 关于意义问题,参见韦伯、蒂里希(P. Tillich)、帕森斯(T. Parsons)等人的论述。

② 例如,权力系统、经济的利他主义、传统法则(尊敬、兄弟情谊、大众宗教)和意义的理性构建。

4. 1986 年的初始研究项目

回顾过去 我们发现 与古典理论及某些关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当代理论不同 现代化的含义更为宽广 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也更加多样。现代化不是一套固定的结构变化模式。艾森斯塔特的比较宏观社会学研究正从此而来。他从帝国政治系统入手进行分析 批判了现代化的古典理论 并于 1986 年在该领域内启动了关于文明的比较社会学研究项目。该项目之核心所在即是: 边界建构对社会系统及其所在环境中的自我选择至关重要 对于集群、组织和人类生活条件而言也不可或缺。这些边界框定了社会系统与其所在环境的关系。现在来看艾森斯塔特的这项研究以及他从中得出的结论 我们会发现 在多元现代性框架之内对现代性的古典理论的重整和修正 是这一计划的直接成果。

可以说 1980 年代末以来多元现代性范式是对全球化理论和研究的间接回应。许多社会学家 如费瑟斯通(M. Featherstone)、拉什(S. Lash)、弗里德曼(J. Friedman)以及罗伯森(R. Robertson) 普遍认同全球化研究中存在两个假设——它同时也表现了社会学理论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这些所谓的异质论者(Heterogenizer) 连同萨义德(E. Said)、巴巴(H. K. Bahabba)、霍尔(S. Hall) 及其他反思人类学家如克利福德(J. Clifford)和马克思(G. Marcus) 在跨文化主义方面所做的工作 都认为普世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区分是错误的 因为西方(the west) 实质上就是帝国主义; 而正由于其帝国主义的本质 西方的这种支配地位只不过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变量罢了。作为一种扩散运动(diffusion) 全球化导源于美国经济和生活方式与其他类型文化的掺杂混合。扩散运动按等级方式展开 依据是美国主义的正宗地位 它是现代主义的继续。持此论者断定 结构变化中不存在趋同化一(convergence)。全球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 它源于美国“可口可乐文化”(Coca Cola Culture) 的君临天下。异质论者采用人种方法学(ethno-methodological) 和解释学 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社会学理论和研究对象 他们认为这些对象都是建构性的 不应脱离研究者的个人社会交往。与之相反 匀质论者(Homogenizer) 或多或少接受一种世界体系和一种全球现代性范式。他们臆断全球舞台背后的结构变动存在一种趋同化一趋势(可参见吉登斯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帕森斯式的功能主义观、卢曼版的功能主义论)。匀质论者认为 存在一些进化的普遍模式或者存在一种进化模式; 现代性本身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物 其特性持续不断地从西方(社会) 浮现出来 因此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现代性。这隐含地表明 进化具有趋同化一性。科学实在论(本质主义) 与科学认识论被这些匀质论者接受 因为他们断定自己研究的对象和提出的理论 是世界原本存在的 因此他们是现代主义者。匀质论者的研究对象依据科学而预先设定 而异质论者则入乡随俗 像民俗方法论者那样 秉承加芬克尔的传统。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分野可以追溯到罗伯森(R. Robertson) 那里 在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科学中也历史久远。

多元现代性是一种可供选择的范式。它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和重新阐释了社会学知识。自 1950 年代起 历史主义范式已被多元现代性范式所取代。自 19 世纪中期始 历史主义已经开始进化 它是对作为规范取向或通行社会典范的西方社会的自画像。多元现代性不是一个列举历史事件的分支社会学; 它是对结构演化进行的多维理论描述。多元现代性并不认为全球现代性是脱胎于西方(社会) 的单一模式 也不把社会结构说成是二元对立的。多元现代性须被理解为对现代化古典理论的批判。我们有证据说明 现代化并不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同化合一。因此 现代化既不是朝向普世方向的进化之路 也非建基于其上。多元现代性是一种结构变化 它不断改变信念系统及其在转化过程中的实现。我们可以说存在多种多样的现代性 但不存在单一的现代性。从范式的角度讲 轴心文明和现代性之间是重新体系化(重构, re-systematized) 的关系。比较研究显示 现代性并非必定要从欧洲轴心文明中产生。结构进化体现了现代性的共同特点,

就像多元现代性中的某一种现代性体现了源于欧洲的轴心文明的结构进化。存在多元的轴心文明和多元的现代性。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种新的现代性理论。

5. 重访韦伯的宗教社会学

这一论题在全球化的时代尤为重要。艾森斯塔特发现,“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的表述是一种误导。全球世界体系由文化、经济、政治和技术等不同的要素所构成。我们已经知道,现代化具有不同的形式和表述(符号表达)。把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欧式的或西式的是错误的。现代化在本质上不是目的论的(teleological),也不是线性的。这对社会进化理论的范式转变意义重大。与韦伯观点不同,现代化并不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共同体的去传统化。这种转变导致韦伯式社会学的终结。理性化的合理化以及社会理性化的扩展,并不是(如某些韦伯信徒的辩护)重建社会结构的最初过程。艾森斯塔特的研究显示,“多种多样且各不相同的现代性”自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就获得关注。于是,艾森斯塔特诊疗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然而,他并没有把韦伯的著作重新解读为是关于理性化分析的贡献,也没有强调韦伯提出的理性化的不同理想类型,而是把它们作为对各种大文明(large civilizations)内在动力的研究。重释韦伯社会学的要旨在于把轴心文明与现代性联系起来。从本质上看,现代性并不是随欧洲之轴转动而生。现代性既不是单一的,也没有一个特定的起源。

然而,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学比较研究形成的一般性洞见认为,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第一,它们由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基本预设所构成,这些宇宙观又存于这些社会以及对社会的正统观念或异端理解之中。这在整个历史中都有所体现。第二,在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经验,或因与其他文明遭遇,形成一种制度化的模式。第三,因人口统计学的、经济上的或政治上的变化,存在基本的内在张力、动力和摩擦力,它们被现代结构的制度化统合起来。第四,现代性的不同方案因上述各类过程之中的(文明)遭遇和互动而形成。这些互动的结果决定了:文明和社会在一个国际系统中如何定位自身,在全球体系中它们的结构进化如何继续进行。第五,在欧洲史上,结构进化促成现代欧洲国家体系。它体现于始自17和18世纪的世界性体系。第六,霸权的转移发生在不同的国际体系之中,这种转移导源于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和文化的变迁。第七,在结构进化过程中,由于自身扩张,各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不断进行。这是因为它们的基本预设及其制度化不同所致,这种现象在西欧、北欧、欧洲其他地方、晚近的美国和亚洲(在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教和日本等文化中)先后上演。

这种重释并未沿着韦伯的社会学道路前行,而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看待问题。就范式的核心而言,这并非世界宗教和文化宗教所带来的问题,也不是现代标识系统(modern marked system)、职业或其规范的分化所造成的,而是一个需要处理的变化框架的问题。此处的参考框架是文明的特性及本身具有合理性的概念,以及异端邪说及宗派运动在结构变动中所起的作用。因此,欧式(西式)早期现代性与后期现代性之间的区分对于这一框架至关重要。我们并不能因为具备了前者那样发生现代化的条件,就推断后者的现代化一定会发生。

差异现代化的动力是一种社会进化过程,也是现代文化方案自相矛盾的过程,它通过自身的制度化而不断呈现。视自己的社会为现代社会——具备一套独特的文化和政治方案,又与其他类型社会保持联系——这是现代化的本质所在。这有史可证,如欧洲、日本和中国等即是如此。因此,现代性是在结构性社会变化的框架内进行的重新阐释,而不是欧式现代化社会模式的一统和约化。理论上讲,当多元现代性形成体系之后,社会系统各成员之间的文化纽带和社会联系,就会重新演绎。

6. 多元现代性范式下的全球化与集体认同

由于本地化(indigenization)、通俗化(vernacularization)、混合化(hybridization)以及对元叙事的批判与多元现代性融洽共处,可以说,从1990年代初开始,艾森斯塔特的学术方向之一就是全球化的社会学研究。我们从他的研究中看到,现代性原则上并不是一统的,它只是社会系统结构变化的一个特征。在这方面,艾森斯塔特把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纳入多元现代性框架之中。重建现代化理论的理论后果是,现代性不是单数或复数的,也非普遍的或特殊的。它出现在各类社会系统的扩张过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传统的转化至关重要,因为在社会系统的扩张过程中也存在一个消除扩张的过程。艾森斯塔特从此处入手,探究现代化过程中社会运动及其功能。反现代性的原教旨主义运动(fundamentalistic movements)被卷进因西方文明化过程所引起的结构变动之中,正如我们在帕森斯的社会学中所看到的。新教原教旨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当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是对现代性背景中的现代化过程的独特反应;它们并不是前现代的或传统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现代主义的规划。但在一个比较进化论的视野中,这些运动与宗教运动类似,这种规划是对整个社会的宗教性控制,例如,历史上的伊斯兰教,作为上帝预言者的穆罕默德成为阿拉伯共同体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同时也成为整个社会共同体的领袖,被以上帝之令专门写进《可兰经》中。这正是它与中世纪基督教精神建构的差异所在,后者须根据基督教和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异所形成的进化论术语来表示。它们都不是政治上所谓的有组织的社会。

在研究结构性变化(即所谓的现代化)时,在多元现代性范式下探讨社会运动具有更为深远的社会学意义。结构性的社会变迁重构集体认同。在一些情况下,这一过程引发多种抽象的认同,如西方社会中对人权的普遍要求和高等精英教育模式的大众化转向。然而,原初的团结和认同并未消失。集体认同(如种族的、民族国家的、宗教的、文明的)、归属感团结、区域性身份,是促进社会系统成员凝聚在一起的初级社会关系,所有这些都由成员资格决定。这不是或然性事实,也不是通常所谓的附带现象,而是一种持续性存在,它在社会系统扩张的边界中形成。这进而表明了,各类宗教运动不仅在以往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而且在当代的社会舞台上也是主角。集体认同与边界的社会建构标示着社会系统中成员的资格,也是不同社会系统中集体边界的一种象征性的组织建构。在此社会学理论参考框架内,我们解释克里斯玛行动的一个方法,是把精英成员看作特定的人,或将其归入特定的群体。认同与成员身份共同构成成员的资格,同时,成员身份标识的流通范围也确定了相关行动的参与程度。特定的社会性质限定了行为的模式——如坏家伙、和善的儒教徒、教养良好的成员等等。至于性别、世代、亲属、疆界这些兼具社会性质和自然性质的评价,也具有一种社会功能,因为它们确立了社会地位的内外层次间的界线,同时也确立了社会系统的吸纳或排斥策略。在此,我们必定会想到施耐德(D. N. Schneider)和史密斯(R. T. Smith)的论述:成员相似性这一规则的制定是参与不同集群的条件,也即是说,固定与其他的集体及其成员的关系,这一点在社会学的社区研究中易于被忘记。

艾森斯塔特和吉森(B. Giesen)曾从世俗性规则(the civic code)——如内隐和外显的规则、传统、日常惯例——和神圣性/或超越性规则(sacral or transcendent code)中区分出原初性规则(the primordial code)。^①集体认同的建构和成员资格的确定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冲突和摩擦。在西方社会,初级社区、国家或民族中的公民身份与成员身份之间的冲突是再经常不过了。社会学家认为,这是社会性(the social)的自我意识,是社会系统的自我选择。社会系统成员从内外两

① E. Eisenstadt, B. Giese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6(1), 1995: 72-102.

个角度对系统边界的认知共同造成了这种意识。集体认同及其固化机制通过成员和陌生人之间的区分来标识。并不像 1950 年代部分现代化的理论家(如 G. Myrdal)以及当代有些社会学家所宣称的那样,集体认同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在现代化过程中,集体认同并不会消失。在这一背景中,颇为重要的是,发生在西方的女性新社会运动、生态运动、原教旨主义教族宗教运动及相似运动,朝局部方向发展,成为新的特殊主义。尤其是过去 10 年中美国发生的反全球化运动更是如此。

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尤其是韦伯,认为现代性和现代化构成欧洲文化和制度的基本要素,它们历史性地同时到来。他们或多或少认为,在西方化的行程之中,这种文化方案将会通行全球。教育的扩张、现代交往手段(技术)、个体主义取向、经济理性化在许多社会产生影响。作为世界文化的现代主义自 20 世纪初就开始传播。现代性已经影响到许多社会的制度领域。但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当代舞台上的社会,通过赋予现代性以不同含义,反现代的政治运动已成为现代化的结构变迁的逆反运动,如改革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当代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尤其是 1871 年之后德意志帝国统治之下的德国,反西方化和反犹太主义不但是经济落后症候,也是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文化方案。其原型不仅包括德国和奥地利的瓦格纳和瓦格纳式的反犹太主义,也包括法国的德雷福事件,后者造成了法国社会的分裂。郎本(August Julius Langebehn)一本名为《教育家伦勃朗》(*Rembrandt als Erzieher*)的书,典型地反映了德国文化、个人身份和精神(德国人的内在性)、自我认同和反犹太主义倾向,这本书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和后来的纳粹极权统治之下都极为畅销。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德国的浪漫主义,在第二次大战后德国的反美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中仍风头不减,这些主义在政治左派和右派发起的社会运动中都能看到。然而,这不仅仅是某些德国人的态度,在欧洲也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在当代研究中,丹丁纳(Dan Diner)再次就此进行了分析。

从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起,现代化的理论家就认为,一种所谓工业社会的趋同化出现了,现代化不再仅仅是历时性(diachronic)过程,也是结构上的共时性(synchronic)过程。这是关于现代性一种新的乐观派观点,认为现代化有望实现。帕森斯认为,对于重构现代化而言,进化的普遍性不仅仅是所谓世界社会之现代性在全球不同文化领域扩张的结果,也是特定的内部社会条件下的发展。例如,贝拉(R. Bellah)通过分析德川家康时代的体制和社会,认为它在功能上对应于古欧现代化中禁欲主义新教的角色。正如艾森斯塔特的分析,对于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古典现代化理论而言,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社会及其社会结构的变迁就是一个反例。

7. 2002 年的新研究项目

朝多元现代性进发的现代性的重整/重构,引发了 2002 年一项新的研究项目。这一项目延续先前的研究,立足于一个更为适切的范式之上。它在某种程度聚焦于民族国家的式微、文化主位,同时也关注新型社会运动、散居群体(在新波罗的海地区和亚洲各共和国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和俄国少数民族)和小族群。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原教旨主义者运动,以及和平运动为这些群体的成员确立了新的社会认同。怀着反抗现代(anti-modern)和抵制西方(anti-western)的态度,通过采取对抗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的暴力手段,各类教族宗教运动(communal religious movements)也在全球舞台同时上演。这项新研究项目直接瞄准因全球世界体系变迁引起的新异变化,这种变迁并非一个单一的实体,而是一个社会系统网络,它导致社会互联单元之间产生了新的张力。更明确地讲,它假定在社会宇宙中,将形成新型的文化和符号规范:在公共空间(如建筑学)中,不仅有后现代主义,也有新融合论,甚至包括文化上象征性的共生模式。网络互联和部门分立直接关系到社会系统边界的重构。

这些新的社会运动出现在非西方社会,但在欧洲和美国的各州中也同时发生。集体认同分析的转向不是传统的方式——用自然特性来描述这些认同,而是把它们描述成现代社会的一个组成单位和一个想象的实体。集体认同因全球化而来的各社会单元之间或各文化类型之间的混融而发生变化。这绝非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这一模式变项的新区别,而是一种遍及全世界的文化和社会融合。尤其是在政治体制之中,政治规则(命令)与公民身份在社会共同体中并不是和谐一致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原初集群在社会宇宙中没有发挥重要作用。2004年研究项目的另一个焦点是,社会系统环境中成员的自我观察(self-observation)被社会性地重构所引起的公共领域的变化。这些结构变化的趋势,是公共领域内的这种自我观察不再像现代化的古典时期那样,按照市民社会组织起来。新的媒介在公共领域中发挥作用,并改变其沟通和符号系统。拟象的世界消除了真实(J. Baudrillard)。新的研究项目致力于研究所有社会子系统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全球化造成的。这些变化不是社会交往的一致性,也未带来地球村(global village),与杂混、碎片化以及新社会运动导致的集体认同的变化恰恰相反。所有这些将会发生在一个全球世界体系之中,绝非是仅由不同的社会结构所引起。

多元现代性范式已然抛弃了西式的现代化,同时也告别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对影。在我看来,社会学理论转向因全球化所致的结构变化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也会影响到对西方现代化过程的重新描述和重新解释。在社会学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源于18和19世纪西方思想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自我描述,例如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市民社会、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当然,劳动分工范式、共同体与社会范式也占据主要席位。因为社会学理论和普通人的思维被源自19世纪的现代性的自我描述所支配,这正为反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西方现代化不再是一种谋划,我们需要在多元现代性中对它进行重新理解或重新思考。相反而成的是:不具有现代性那种自我描述的后现代性,自19世纪以来都与多元现代性和谐共处,因为并不存在一统的现代化模式。二者都是从理论的角度对始于1960年代早期的社会结构变化进行描述和重构。但有一点应该交代,如果多元现代性不能按照现代化古典理论中有关进化论的基本假设进行分析,那么“现代性”、“现代化”、“现代”这些表达就会改变它们在社会学理论中的意涵。能够认定的一点是,这种变化也会持续改变社会系统的所有成员的共同思维。^①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鲍磊 译)

(责任编辑 赵枫)

① 在此,我像艾森斯塔特一样使用“社会”这一概念,也即是说,以一种与帕森斯的用法相对应的方式使用它。作为一个术语,它意指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交往空间,或者是文化方案中的同质性。这并没有把异端社会运动、异类群体以及异型文化排除在外。例如,在分析性行动参考框架内,帕森斯按照社会与其环境的自足性(self-sufficiency)把社会描述成一种社会系统。但在社会学理论中,如卢曼引入的社会概念,不是按照区域或文化方案来定义,而是在理论上把它设定为一个统一的概念,构造一般社会系统理论。因此,对卢曼而言,世界社会产生于高度复杂性的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在某种意义上,社交方式不是按照区域范围固定的,不像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中那样很少或没有重叠。但我认为,如果不把这一术语的外延限定在特定的社会单元,不把初级互动系统限定为社会性/社会(the social/society)的模式或司法建设(如社会观念,societa),使用此种表述亦不会产生误解。我们使用此项表述仅指社会中成员身份的确定,其内容有关我们现正研究的社会体系或社会结构的类型及其成员身份资格。

and lack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capability. Breakthrough must be made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o establish a universal coverage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o develop such social and public services as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and to optimize policy for better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China: Problems and Solutions

ZHU Li ,LONG Yong-hong

Evaluation criteria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are three interdependent parts: justice in share ,in system and in social recognition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the injustice of which in this country reveals itself mainly in share. To be more exact ,there is inequality in their share and account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between the advantaged and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Injustice in system can be seen in the fact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not observed ,let alone reinforced. There is no legal institution for people to go to claim their environmental rights. Social recognition of injustice is often ignored ,and that is why injustice may usually escape from people's attention. The curbing strategies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are to prevent likely damage to environment by any form of coalition between money and power ,to adopt environment-friendly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guarantee environmental system of justice ,and to educate people so as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in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at is a comprehensive program for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in the way to "cooperate efforts in controlling pollution".

Dialogue between Cultures or between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Modernity: Multi-Modernity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Shmuel Noah Eisenstaedt

Going against classical 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giving up the single pattern derived from the West ,the theory of multi-modernity focuses on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modernity of different kinds ,and regards modernizations in different places across the world as outcomes of different structural evolution in society. Multi-modernity gives rise to the restructure and definition ,realized by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nd social movements ,of different societies and cultures ,highlighting their openness and capability of reflection. Tension and clash between modernity of various kinds can be narrowed down as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and orientations of modernity.

Shmuel Noah Eisenstaedt's Paradigm of Multi-Modernity

Gerhard Preyer

It is a new march of Eisenstaedt's research on multi-modernity in the theory of modernity ,which underlines indigenization ,vernacularization and hybridiz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highlights the interrogation and critique of the meta-narrative. It reveals ,moreover ,internal tension and conflict within global social system ,and emphasizes changes in public sphere resulted from the self-observation of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Finally ,it values more the global world system ,rather than different social structures.

Policies Concerning Youth Movement in Early Days of Kuomintang Government in Nanjing

YAN Hai-jia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Nanjing Kuomintang (KMT) Government ,the KMT became a ruling party ,and its policies concerning youth movement changed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the making